

原载《世界历史》第1期(试刊)

(1978年12月5日)

选登在《陈翰笙文集》P463

陈老著

其文

抄件

在世界史之误怎样研究

革命的导师们向来非常重视历史这门学科，这是因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演变而来的，而世界的明天又必需靠今天的努力。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者，担负着改造和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尤其应当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界历史发展过程，那就难免会蹈覆辙，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问题虽清楚，我们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历史。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书信中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要怀疑或释疑，‘历史的意义’，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以任何一个哲学字派，甚至以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逻辑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註一）毛主席也曾经指出学习历史的重要。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註二：《马克思全集》，人文版，1961年，卷一，页650）

中,谈中国历史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本身,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註二)有一次周总理听到王治秋同志告诉他说,“现在中山大学不教中国历史了,大学只教习内战诸四史。”总理马上问,“哪四史,回答说,中共党史,世界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总理又问,“没有中国通史吗,那怎么行呢,中国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不学通史,总得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嘛。”(註三)总理在这里虽然说的是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又何尝不是一样重要呢。如果^制能融汇贯通整个的世界史,那就可以把它作为我们^制改造革命

註二: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卷三,页757,759。
 註三:人民日报,78年7月30日,第六版。

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南。

我国古代的^史历史是包括在经学以内的。王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章太炎认为，“^经经之学误至度，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其後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宗，治人之道，别史家是有独至。於是「经」「史」遂似判然二途。”“古无史之特称……”（注四）

在西方上古时代，历史也是文字的一部分，柳有“西方历史之父”称号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在他写的一部《希波战争》里，他的笔调生动鲜明，引人入胜，但因此而常与在史实中穿插一些不足可信的故事或传说。那时西方文字和历史也是分不开的。欧洲中古时代历史和神学也是分不开的，历史的著述，著重神佑人类的天保，例如罗马帝国的末期，北非主教奥理略·奥古斯丁（354—430年）所写的《上帝之城》的内容也注四：章太炎《福经史佛之综合》见《华氏集刊》第二卷，商务印书馆，上海，1935年元月刊行。

是这样。

历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还是在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在西欧开始的,辟破藩篱时我国仍提倡复古主义,史学才成为显学,才有历史课程和史学教授。最近到了1970年代,欧美史学著作纷纷译介进来。至于在我国直到十九世纪末,开设公立学校的时候,才有历史的课程,最近几年才有中国通史这门著作。

可惜直到现在写世界通史的人仍,只是把欧美史的一些国家以历史,或多少的分期叙述一下,就称是一部世界史或世界通史,并未说明社会结构如何演变的,人类如何进步的。无编学术性著作,或通俗著作,都有这个缺点。英国剑桥大学编著的《世界近代史》,阿诺德·约瑟·汤恩比所著的《历史研究》,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

北京大学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史分)
以及周一良、吴于廑合编的《世界通史》都存在
这个毛病。

至于世界史的通俗读本,例如早年出版的爱
· 威· 威尔逊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
的故事》,1974年出版的爱· 齐· 爱波特主编的
《世界简史》1976年出版的洛恩比著的《人
类与大地》,也是按时代编写的,在通书时期内讲
一些国家的历史。有些作者甚至借此机会宣传自
己的偏见。例如洛恩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
里,宣传欧洲社会终究将接受上帝的意志。又如威
尔逊《世界史纲》的1974年版,还在一些歪曲事
实而反对共产主义的谬论。

上面列举的一些著作,表面上看来,好像都是
全面的《世界通史》,其实这些著作,仅是《国别史》的

拼凑,很难使读者通晓社会的组织如何转变,人类
 的文化如何进步的。换句话说,这种在界史的写法,
 没有说明原始社会如何分化为阶级社会的,阶级
 社会中又如何通过斗争而改变生成条件,促进生
 产^力向前发展的。这样的著作,不能起到真正的教育
 作用,只能使读者知道过去一些历史事实的本身,
 但不能明白整个社会进步的内在因素。其界史
 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了解^(过程)社会组织如何改变,
 从而~~知道~~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是~~围绕~~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而^{从而使这门科学成为指导}规律,也就是要^用来^来水^水开^开革命的,思^思意^意武^武田^田,
 这才能称得上是一部真正^{有甲}的^{实际}世界通史。^{张大的}

任何事物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正因为研究
 世界史的工作,还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所以存在
 上述的缺点,并不奇怪。

那么怎么样的一部世界通史,才能称得上真正有

意义的呢？首先应该从各地区或各国选择一个典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来说明在世界历史应变化的过程。从一个典型的社会来分析它的应变化，就可避免现在世界史一般的缺陷。已经出版的在世界通史，往往都叙述一些社会应变化的事实，却不能从这些事实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其实我们应当以无产阶级的没有偏见的立场观点去分析阶级关系、组织体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的规律性，和其发展的各种原因。因此应该选择一个典型的国家或地区来把问题分析清楚，才能明白它的意义和发展的规律。当马克思以英国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时，他就告诉开列斯国必然有同样的趋势，了解了英国的今天就可以预料开列斯国的明天。（注

五)

注五：马克思《资本论》初版的序言，1867年2月21日，伦敦。

其次还应将各大洲或各国同类型的社会,尽可能地作比较,说明它们之间,相同和相异的情况,以及互相影响的事迹。这样就有助于证实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任何一种社会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的阶级斗争。现在的世界通史,虽也提到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分析它的起因后果和它的过程,这样就不能使读者明白一个社会的转变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今后我们编写世界史,应当避免上述这些缺点。

总而言之,拼凑各地区或各个国家的历史而编写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读者了解一种社会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也不能了解怎样影响前一个社会的外来的影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而失去社会向前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有一部好的世界通史,那末我们就能

这样便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问题,这付

(15行×20字)

革命心

变社会使它向新发展。因此我们要急起直追来研究
 世界史的研究。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呢，去年已经首五
 六千年的历史，有关世界历史材料^真如又深又
 广的矿藏，正待我们去挖掘。如果我们不去研究
 而挖掘第一手的材料，仅以根据书刊文章中一些
 论断不可靠的资料而进行研究，就不可能把工作
 做好。研究工作应当从大量可信的史料中去精心
 探索，我们必须~~在~~在充分地点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
 上，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
 和综合。切忌先有一个结论再去拼史料凑证的作法。

毛主席说得好：“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
 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又提醒大家，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勿止你对于某个
 问题的发言权。”又说，“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

况和历史情况既出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註六)大家知道,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著述《资本论》,曾经读过一千五百多种书籍,并做了大量的摘录,他正是在充分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科学结论的,他的学风,为我们的研究在世界历史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那么那些历史材料是我们必需阅读的呢,第一手资料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经过地下挖掘出的大量文物资料。第二是中外国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各种档案。第三是可靠的尤其是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第四是当时^{或较为可靠的}当地的通讯报道^{这些}。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世界史必需采用的材料。第二手材料,便是^{或较为可靠的}各种历史^{或较为可靠的}著作。

记得1920年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芝加哥註六:无懈在著作送读甲种本,1964年夏187。(300字)

大学的白莱斯特教授著述了大部的埃及古代
 史,他的著作都是根据埃及挖掘出土的远古的文
 物加以分析研究而写出来的。瑞典的伯尔富拉大
 学1956年一百多学生上古代史课,他们的教授也
 到埃及去参加远古挖掘工作。近年来美国有不少
 学者也到埃及去搞远古和研究古代史的工作。可见研究古代史是要同远古工作密切结合
 起来的。可惜我国研究古代史的人们,很少根据国
 内几十年内出土的文物作为研究古代史的第一
 手资料而写出论文或专著。现在只有“文物”推
 陈和“考古学报”,而没有关于我国原始社会,或
 奴隶社会的专门著作。其实,近年来,黄河下游,挖掘
 出来的属于^{大河}新文化的远古的文物,以及广东、
 四川、浙江这些地方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应该予以
 供给我国研究我国上古史的资料,並同埃及和巴

以偏的奴隸社会作分析比较。

在界各国政府的档案,有些俗称为蓝皮书或白皮书,也是研究在界史的第一手材料。欧美各国,早已将几十年前的档案整理以后,公开出版,可供史学家的探讨。我国虽有档案馆的组织,还没有把档案编成有系统的参考资料。但研究历史的人们,可以在明清档案中材料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十九世纪陈兰彬等在巴去调查华工的报告,俗称为醒速录,就可供我们了解大批华工在海外被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奴役的真相,以及他们为西方殖民地开发资源的劳绩。可见在尚未出版的档案中也有许多第一手史料。在较早出版的外国档案中也有许多有意义的史料。元季1932年冬,我在广东沙面美国领事馆看到一些档案,其中就有1900年李鸿章通过他的医生英国人马克,私自介

结当时英国首相,要那位首相向慈禧推荐他当议和全权大臣。这还证实了李鸿章私通外国的事实。

研究印度近代史的人,不免要看马·敏·罗易的回忆录,看了这部书,可以明白1910年代印度抗英运动的内幕。要明白远东地区而霸斗争的历史背景,还应当读一读埃及是瓦希·萨达特所写的回忆录。好些回忆录,是研究在晋史的茅一手资料。如同回忆录一样,日记也是茅一手史料。例如最近那国搞历史的人,对于洪秀全的去在,百思不得其解,终于在日记中才得到证实,当时曾国藩欺瞒清廷,伪称洪秀全“服毒自杀”,但根据李秀成的自述,和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来证明洪秀全是因为病而死的。(注七)还有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信件,也是茅一手材料。如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观,列宁的书札等,也是珍贵的史料来民。

註七:袁增月报(北京)1978年9月12日

稿 纸
商务印书馆

(15行×20字=300字)

当时就地的通讯报道也是研究历史的节一手资料。可以举例说明,1928年5月18日香港大公报载有关于阿拉伯国家婚姻制度,这些国家的农村里,妇女跟男人分担不少农务,但她仍还认着自己是他丈夫的附属品。在谈及生育时,做丈夫的要与妻子离婚,他只需在一位证人面前向妻子连说三次“我要抛弃你”双方的婚姻关系便告终结。这种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痕迹,在美国是找不到的。但在西亚北非一些阿拉伯国家,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

资本主义最早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怪现象还层出不穷。例如1924年11月4日巴黎的左岸报,记者就报道的情况说。法国莱吉奥地方三百六十七个农户组成一个果园合作社,拥有一千公顷土地。这个合作社有现代化的水果

貯藏起来,可以把新鲜的苹果,保存到一年以上。1974年,苹果丰收,仓库也放不下,但为了保证法定价格,不能降低价格出售,结果竟将从树上摘下来的几万吨苹果,直接运到垃圾场,用压路机把苹果碾碎,变成灰色的大堆垃圾。这种因为保障资本家的利益而造成惊人的浪费现象,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也就是论述资本主义的可靠的历史资料。

阶级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是长期的。十月革命以后,可惜苏联的无产阶级由于防止修正主义复辟,作上死搬硬套无产阶级的事,以致资本主义现在依然统治。日本东京的《世界周报》1978年5月30日即6月27日,登载了寄驻莫斯科五年中的一位日本记者,这回^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回国报告:亲身接触到的苏联》。在这篇文章里,他概括地描绘了今天苏联的社会。他说,“苏联这个

国家,在政治方面是官僚主义体制,在社会方面是自升服务的社会。官僚主义和自升服务,是苏联社会的两种不治之症,已经成为一切工作效率低的原因。视定田定章说,苏联官僚主义的表现是许多干部只是接受上级白指示办事,而没有主动工作的热情。他言对苏联商店营业员很冷淡的态度,即使一个营业员很空闲,决不去帮助另一位忙得张不开嘴的营业员。苏联有一种惟自己负责的工作,绝不拆手的风气。

视定田定章还说,在苏联贿赂是万能的。书店经理制场告票要主任,海关官员,甚至警察,无一不收贿赂。在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知识份子,对这位日本记者说:“苏联人的意识和十九世纪初果戈里(1809年至1852年)时代的意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即不同的,视定田定章时代只有沙皇一人统治,而

现在苏联党十五人统治,只是把社会主义的幌子,
 大在愚昧意识依然如故的俄国人的头上^{罩了},这
 个报道,反映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真相,可以说,这也
 是研究在苏史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手资料,便是可靠或较为可靠的历史著
 述。例如公元七世纪唐太宗时代口授他学生魏徵,
 而编撰的《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当时138个
 所谓国家的历史和地理。又如十一世纪司马光所
 撰的《资治通鉴》和十八世纪乾隆时定版的《
 二十四史》,以及各省、府、县的地方志,都是开国重
 要的历史参^{资料}考。至于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利奥
 波德·芳兰克,根据官府的档案,而写成的一部拉
 丁民族和拿破仑民族诸国家的历史,便是关于欧洲
 中古史的参^{资料}考。

1976年巴黎出版的《法兰西的弊病》一书,

可说是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在学史界史学界为作者立
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佩雷菲特，他曾任戴高
乐党的总书记。他在这本书里揭露了法国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在法国官僚主义，
从文艺复兴，手续繁琐。因此盖一所中学，需要经过二
十道工序，十九个部门批准。修建一个大学，经过
病中心，需要涉及五十个有关部门，一百多次往返
周折，耗费了十年的时间。又如法国原来留尼汪中请
修建一座疗养院，能修多远，竟没有批准。拖延到
由立法机关规定疗养院的窗户，必须朝南向阳，而这
个疗养院的设计，窗户却是朝北，官吏们却不知道
留尼汪位于南半球，朝北才是向阳。在阿兰·佩雷
菲特这样的著作里，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
又在法国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而赶不上美国。
还有一部值得研究在学史界的书是《手资料》。

那就是南斯拉夫著名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
弗拉迪米尔·格迪耶尔所著的《苏南冲突经历》
一书。他叙述了 1946 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签订了南
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经济合作协定。双方同意先建立两个合营
公司，即尤斯塔航空公司和尤斯塔运河公司。合
同规定，航空公司的全部盈利是按投入的资本多
少分配的，俄国人把他们投入的货物股份估值纸
高，而把南斯拉夫的股份估值低。也就是把南斯拉夫
的财产是按上货币比较稳定的 1938 年的价格估
计的，而俄国人的财产是按上 1946—1947 年间物
价腾贵时的价格估计的，这就使南斯拉夫蒙受了
巨大损失。而苏联则可以按上投入股份的比例，得
到^比南斯拉夫多得多的盈利。尤斯塔运河公司也
是以这样不公正的条款订立的。

这位南斯拉夫作者,又谈到关于建立石油开采和加工的南南联合公司的条约草案,在第八条里,突出了公司的垄断性质,规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授权公司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全部领土上勘探和开采油田。”又在第十条中规定,公司享有特殊的权利,那就是可以同南斯拉夫自己全部投资的公司一样地享受一切权利。可是没有规定要对南斯拉夫的法律负任何责任,实际上就使这个石油开采公司享有治外法权(注八)

本书作者,颇有感慨的说,通过^{建立}这些合营公司的谈判,可以清楚地看出南联公开宣布的政策美化的大团实际利益之间,确有本质性区别。他说:“一方面是满嘴的好听的论,国际主义啦,社会主义团结精神啦,范围内的无私援助啦,另一方面则是

可怕的深渊。他们对年轻的革命的南斯拉夫提出
注八:弗拉迪米尔·达迪耶尔著《南南冲突经历(1948-1953)》
商务印书馆译,三联书店,1977年,页106,110,113,129。

纯粹是剥削者的不平等的要求。”(注九)可见他写的这本书,颇有供研究在晋史的人作为一种参考资料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何应用第一手和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在晋历史是一门^{阶级}理论性的学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来。目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搏斗的时代。我们的立场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大不妥协的立场来探讨整个晋史,决不可被资产阶级史学家所蒙蔽。我们知道,只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才是最进步的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才能摆脱一切偏见,才是最不妥协。所以我们的必须很好地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大量的资料中选择核对那些具有最典型的资料,来

(注九:同上,页128。

竟无顾忌地拘于在界内^史发展以内在规律。但必须
~~新~~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
 析和综合,最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切忌先有
 一个结论,然后再去拼凑资料来证明。

还有我们搞研究工作的人,必须学会分工合
 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应很好地发挥分工合
 作的威力,群策群力,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毛主席
 教导我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
 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註十)我们的研
 究在界史也必须采取有组织,有领导的分工合作
 制度。

一部世界历史,说到底,是在界上被压迫民族
 反抗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历史。
 在界史更要叙述压迫民族和压迫阶级对人类历
 史犯下的罪行,也要记录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所
 註十 毛泽东选集 卷三,1967年,页760。

级为自身求解放而进行着继续的斗争的历史。因此一部世界史，^{实际}就是一部世界阶级斗争的教科书。

可是为了要完成编写世界史的任务，还需要研究好些目前还没有了介的问题，例如：原始社会是怎样崩溃的，开国奴隶社会起于何时，欧洲部落的历史兴败跟两洲的有何异同，开国的奴隶社会跟其他各国的有何不同，中国古代跟近代兴败跟各国的文化交流是怎样发展的，中国跟西欧的封建社会有何异同，宗教跟阶级斗争有怎样的关系，近代史上黑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怎样被殖民主义者奴役，最近半世纪内帝国主义有何新发展，帝国主义是怎样衰落的，欧洲各国是怎样相继宣布独立的，苏联为什么会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开国的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又佔在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些问题如未很好地解决，那就不难编写一部被认为是好的世界通史

因此我们

之一,我们还有很悠久的历史,应该经常让阶级和
国际主义的主场欢乐去,我们也有责任来认真研
究上述这些问题。希望若干年后,能编写去一部符
合我们要求的世界通史,对自在界_{人类}去应有的贡献。(人)✓

陈翰笙

1978年10月1日

北京东华门大街38号